

III MAKESIZHUYIYU DANGDAI ZHONGGUO

#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

北京大学

党委宣传部  
社会科学处  
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

党委宣传部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 编  
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  
编委会

主任：吴树青 赵存生

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陈占安 赵为民 钟哲明

夏文斌 程郁缀

执行主编：夏文斌

编辑：杨康善 孙占龙 孙 华

王荣奎 张 琳

# 目 录

北京大学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代序言)·····	任彦申(1)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中国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论的确立·····	龚育之(5)
一个哲学理论体系,两个应用发展阶段——邓小平	
哲学思想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关系·····	石仲泉(24)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伟大胜利·····	赵存生(37)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沈宗灵(45)
深入学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吴树青(63)
邓小平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张汉清(75)
三大伟人和中国经济学发展之路·····	赵  靖(89)
学习邓小平同志的社会发展理论——在邓小平理论	
指引下,中国社会学不断前进·····	韩明谟(104)
论科学与民主·····	黄楠森(118)
在“结合”上多下功夫·····	张启华(131)
试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	梁树发(143)
正确理解初级阶段与党的根本任务·····	梁  柱(152)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贡献·····	赵家祥(160)
马克思主义与我们的时代——兼谈“全球化”问题·····	钟哲明(168)
邓小平理论是指引我国改革胜利前进的旗帜·····	阎志民(182)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进所有制改革·····	刘  伟(194)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	
基本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张翼星(215)

## 学习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推进科教

- 兴国战略实施…………… 罗玉中(225)
- 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的精神文化…………… 赵 杰(240)
- 邓小平法制思想探析…………… 王寿林(251)
-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 李士坤(262)
- 内在于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谢 龙(274)
- 邓小平大战略思想研究…………… 王福春(281)
- 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接力探索…………… 陈占安(295)
- 东方社会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夏文斌(320)
- 关于学风问题…………… 张晓林(330)
-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 陈志尚(342)
- 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贡献…………… 董学文(353)
- 深刻理解准确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王登峰(363)
- 学习邓小平关于新时期执政党党纪建设的理论…………… 仝 华(369)
- 邓小平改革思想述论…………… 关海庭(381)
- 邓小平理论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孙蚌珠(400)
- 论邓小平对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  
    的理论贡献…………… 李淑珍 侯志山(412)
- 邓小平的历史观…………… 康沛竹(425)
- “解放思想”与“不争论”——兼谈树立正确的学风…………… 关成华(433)
-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兼论北京大学  
    在其中的历史作用…………… 杨金海(440)
- 论邓小平关于民主与专政、集中、法制、纪律和党的  
    领导相结合的新阐释…………… 黄书进(449)
- 全面理解和把握认识真理性的检验问题…………… 邹 林(458)
- 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  
    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研讨会述评…………… (466)
- 后记…………… (470)

# 北京大学与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传播(代序言)

任彦申

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迎来了她的百年华诞。把5月4日定为北京大学的校庆日,不仅是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的永久纪念,而且突出反映了北京大学与这场伟大运动的深厚渊源关系。一百年来,北京大学始终以中华民族的振兴为己任,“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一脉相承,代代相传。北大作为中国的著名学府,不仅以出人才、出成果著称于世,而且以研究、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而为人称道。特别是在20世纪初叶,北京大学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作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地和中国共产党初期活动的重要基地,在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和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独特的重大作用。

北京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1898年在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中应运而生。她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的最高学府。成立之初,严复等受到西方文明洗礼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就来校讲授西学,为大学堂引入一股清新之风,面对着当时列强纷至、国势衰微、百日维新失败、辛亥革命成果丧失等严酷形势,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冲破种种禁锢,开始面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从1915年起,一场以爱国救亡为主旨、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大学率先兴起。蔡元培校长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冲决了封建思想的牢笼,为新思想、新文化的

传播开辟了道路。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刘半农等云集北大。他们授课讲演、出版刊物、组织社团、开展辩论，使北大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源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为之振奋。当时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立即把目光从欧美转向了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成为在中国研究、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在校内外的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1918年冬，李大钊在北大发起组织中国最早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从此，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北大异军突起，迅速传播。1920年冬天，李大钊倡导创立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该研究会公开声明以“集合信仰和有才能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为宗旨。之后，又公开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报名参加者非常踊跃。1921年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就有50多人，到1923年达到250人以上。这些马克思主义社团，收集借阅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文献，编译社会主义的书籍，发表论文，进行讲演，组织讨论，并开展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若干专题的深入研究。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从1918年起，李大钊先生就陆续正式在北大开设《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现代政治》、《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等课程，在中国破天荒地把马列主义理论引入课堂，编成讲义，并且进行考核。1923年在北大学生中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在问及“现代中国流行的各种主义你相信哪一种”时，被调查的426名男学生中，选择社会主义的达到203名；被调查的30名女学生中，选择社会主义的达到22名。可见当时社会主义思想在北大影响之广大。因此，可以说北京大学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最重要的基地。

真理总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五四”时期

的北京大学,可谓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各式各样的思潮,五花八门的“主义”都纷纷登场,一竞短长。有的主张复古守旧,有的循着西方自由民主的途径前进,有的向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迅跑。通过这种争鸣、竞争和较量,符合时代潮流、顺应历史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终于独树一帜,掌握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我想,学术自由的目的是为了求得真理,思想解放的最高境界是做到实事求是。我们欣赏五四时期北大的学术活跃、思想解放现象,更庆幸这种学术活跃和思想解放的结果是找到了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就使得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这种结合的最高理论成果,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并以她为指导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北京大学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培育和造就了一批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战士。1920年10月,李大钊发起创立了中国北方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发展了13名党员。还有一批在北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志士,陆续走向全国各地。他们像一颗颗火种,把马克思主义引向全国,注入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者,许多都来自北京大学,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张太雷、高君宇、范鸿劼、何孟雄等,还有在后来革命进程中变节落伍的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等。据统计,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全国8个地方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中有6位是北大的师生或校友。全国仅有的53名共产党员有21名是北大的师生或校友。参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有5名是北大的师生或校友。北京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初期活动的主要基地之一,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北京大学的历史,或者说通过北京大学这一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一所著名大学对一个民族的兴衰具有多么重大的责任,对一



个国家的社会历史进程具有多么重大的影响,也表明了今天中央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是完全正确的。通览中外,一所著名大学必须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不但应当成为引进外国先进文明成果的前哨窗口,而且应当成为维护本国优良文化传统的中流砥柱;不但应当造就能够攀登科学文化高峰的科学家,而且应当造就能够治国兴邦的政治家和能够强国富民的实业家。在这百年校庆的时刻,北京大学本着“弘扬传统,繁荣学术,面向未来,促进发展”的原则,积极发扬光大在百年历史中形成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自觉地承当起科教兴国的历史重任,在回答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上有更多更大的作为。学习、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是北京大学的优良传统,也是北京大学最可宝贵的财富和巨大的政治优势,我们一定要十分珍惜这个传统、财富和优势。如同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样,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实践证明了,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新时期的北京大学,应当积极响应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发出的号召,坚定不移地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始终不渝地用邓小平理论教育干部和群众,在当前兴起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中奋发有为,做出无愧于前人的新的历史功绩。

#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中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确立

龚育之

(一) 今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也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大讨论的二十周年。二十年前的这场讨论,为从思想上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场讨论,针对的是1977年2月提出的“两个凡是”。

粉碎“四人帮”,是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中国历史的前进,打开的闸门。但是,历史在前进中出现了徘徊。而出现徘徊的一个根本缘由,就在于“两个凡是”。

展开一场真理标准的讨论,澄清“两个凡是”的是非,这是历史前进的要求,是人民利益的要求,是走在前列的党的许多干部和许多理论工作者的要求。

早在1977年5月,邓小平同志就鲜明地批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是收入《邓小平文选》的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一篇文章。

当然,这在当时只是党内的谈话,不可能公开发表,也还不能成为党内文件,但确实已经在党内一部分同志中传播开来,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成为党内文件的,是这一年4月邓小平同志致中央的信和7月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复出时的讲话。这两个文件以“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这样的正面阐述的方式,实际上批评了“两个凡是”。

在这次中央全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同志在阐述“完整准确”时已经强调：实事求是毛泽东作风中最根本的东西。接着在讲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纠正经毛主席圈阅过的“两个估计”的时候，他又提出，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此后，“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成为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概括和经常话题。

这个情况，形成了一个总的政治背景和思想指导，使得适应历史的要求，提出真理标准的讨论，成为可能，成为必然。

在这个总的背景和指导下，中央党校几百名学员总结历史经验，讨论“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内几次路线斗争的是非时，当时主持中央党校日常工作的胡耀邦同志就提出要以实践作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

与此同时，理论界也有一些同志发表了和撰写了论述真理标准的文章。

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了经胡耀邦同志审阅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第三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等予以转载。这样的宣传阵势和随即引起的尖锐批评，激发了这场大讨论。

正如后来邓小平同志在陪同朝鲜党的总书记金日成去四川访问时，在火车途中所说的：

“粉碎‘四人帮’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坚持‘左’的政治路线，又提出了错误的思想路线，叫做‘两个凡是’。我说过，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会承认‘两个凡是’，因为那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我就不能出来工作，更不用谈别的问题了。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问题的讨论。当时有一些人抵制这个讨论。一九七八年六月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一篇话。以后我从你们那里访问回来，在东北三省沿途又讲这个思想路线问题。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

（二）真理标准讨论最大的意义，就是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思想准备。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对真理标准讨论作了总结，并且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大的意义，就是开辟了党的历史的新时期，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和新理论——邓小平理论。

在十五届二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他说：

“今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我们党实行改革开放二十周年，中央将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利用这一时机，在全党开展一次用改革开放二十年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经验，教育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活动，我想是很必要的。近年来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干部，相当一部分同志对建党以来和建国以来的历史不是很熟悉甚至很不熟悉，有的同志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也不太熟悉，这就更需要自觉地用这些历史的实践经验来提高和丰富自己。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

这里讲到建党以来和建国以来的历史,特别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历史。可以说,建党,建国,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三个历史环节,划分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三大篇章:

从建党到建国,是党的历史的民主革命篇;

从建国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前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史新篇。

党史新篇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这是有深刻的历史含义的。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是很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很重大的历史意义。没有这个,就不可能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了这个,就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提供了契机。但是,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不能真正实现历史要求于我们党的伟大转折。只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实现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批评“两个凡是”,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清除“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恢复大批老干部的领导职务,逐步形成实际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和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系列事件和人物),在这四大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改革开放迈开步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始形成,党的历史才真正实现了伟大转折。

所以,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这不是通常的对任何重要历史事件都会有的二十周年的纪念,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新时期二十周年的纪念,是对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二十年收获的纪念,是对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实践和胜利二十年历程的纪念。

(三) 十五大报告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史发展和邓小平理论的发展,作了一个高度凝练的概括:两个重大历史关头,

两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第一个宣言书,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那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实现了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伟大转折,开辟了建国以后党的历史的新时期。

由此启动的思想解放,不断向纵深和广阔发展,展现出从政治到经济,从实践到理论,波澜壮阔、汹涌向前的生动活泼的历史画面。

概括起来,举其大端,可以说有五个重大的、决定性的推进。

这就是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的完成。

这就是包产到户和经济特区,它是改革开放在实践上的两大突破。

这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它是改革开放在理论上的两大突破。

实践上的突破当然都联系于观念上的突破。观念的突破、理论的突破,都意味着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

第二个宣言书,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

新阶段,是新时期之内的阶段划分,不是另一个新时期。

十四大有三大决策:抓住时机,加快发展;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三大决策,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又都要求、都推动着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

“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要害是个性“社”姓“资”的问题。历来都是这样一个问题。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对反右派严重扩大

化、“大跃进”、反右倾、八届十中全会及其以后的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的拨乱反正，归根到底，都是一个姓“社”姓“资”的问题（重新弄清楚什么叫坚持社会主义、什么叫复辟资本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围绕包产到户、经济特区、商品经济、初级阶段的争论和困惑，归根到底，也都是一个姓“社”姓“资”的问题（实践证明，我们所实行的包产到户、经济特区、商品经济、初级阶段姓“社”不姓“资”）。就南方谈话的时候突出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来说，就是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市场经济是不是必定姓“资”，不能姓“社”？南方谈话引导我们党冲破这个思想束缚，十四大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当然是思想解放的又一个更加重大的、决定性的推进。

解决姓“社”姓“资”的困惑，在理论上，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理论反复提出和阐述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在实践上，就是要以三个“有利于”为判断的标准，来决定我们的方针、政策、办法、措施的取舍。三个“有利于”，正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才能有利于社会主义。这当然不是不讲社会主义、不问社会主义。关键是按照什么样的思想路线去讲、去问社会主义。是离开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按照僵化的观念去抽象地讲和问？还是在实践中根据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去讲、去问、去探索、去试验，从这样的探索和试验中去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去创造性地坚持、检验、更新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观念？

（四）十五大是在邓小平逝世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十五大对这个历史课题，向全党、全国、全世界作出了坚定的、明确的、正确的回答。

十五大又有三大决策：抓住机遇，开拓进取；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确定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

进党章,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作出新的阐发。

十五大报告指出:在走向新世纪的形势下,面对许多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艰巨课题,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不断开拓我们事业的新局面。

十五大在新时期思想解放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怎样的呢?十五大对于当前思想解放的要求是怎样的呢?我以为,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按照十五大这三大决策来认识和把握。

三大决策,都是解放思想的成果,又都要求、都推动着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

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勇敢地面对挑战和考验,迎接困难和风险,这样的精神状态对解放思想是很高的要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三大方面,每个方面都有新的概括,都要求有新的思想解放。

仅就经济方面来说,乃至仅就经济中的所有制这个方面来说,改革要有多方面的突破,思想解放也包括众多的内容。比如,确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比如,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比如,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比如,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提倡以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比如,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同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等等。在这些问题上都要解放思想。

所谓姓“公”姓“私”问题,也还是属于姓“社”姓“资”问题。以为社会主义只能是全盘公有,不容许公有为主体条件下的生产资料私



有,以为公有又最好都是国有,不容许探索公有制实现的新形式,这样的观念需要突破。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遵循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解决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实现形式,正是在所有制问题上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才能有利于社会主义。这当然不是不讲公有制、不问公有制。关键是按照什么样的思想路线去讲、去问社会主义公有制。

再就政治方面来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确定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目标,这是很大的思想解放。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相适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领导体制、领导方法的改革,这也是很大的思想解放。

把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对它的精髓、它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它的世界眼光和时代精神、它的科学体系和革命风格的认识,提高到十五大的新水平,按照十五大的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方针,解决好学风问题,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按照十五大的要求,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都要求进一步的思想解放和推动着进一步的思想解放。

(五)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路线、纲领的确立,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最重要的成果。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邓小平理论中的地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理论和实践的实际根据、国情根据。**

四大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理论在哲学认识论方面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邓小平理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基础;社会主义本质论,是邓小平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则是邓小平理论在中国国情判断方面的基础。而邓小平理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特色和创造,都结合到、落实到中国国情判断这个基础上来,或者说,都从中国国情的实际出发。